

跨出古老陈旧 走进近代历史

—— 民国时期的杭州

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古老的杭州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始踏上近代化的历程。1927年杭州建市之后，市政建设和经济文化都有较快的发展。可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杭州市受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置广大人民强烈的和平愿望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杭州同国统区的其他城市一样，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杭州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形象地表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坎坷命运。走向近代化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近代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本文拟对民国时期杭州社会的演化，作一综合考察。

光复后杭州的变化

在汹涌澎湃的辛亥革命浪潮中，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911年11月5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杭州举义，一举摧毁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成立浙江军政府。但这次革命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因此，新、旧军阀得以卷土重来。北洋军阀杨善德、卢永祥、孙传芳等利用浙江革命党人的妥协动摇和内部矛盾，相继进入浙江，并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北伐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杭州成了新、旧军阀统治浙江的据点和中心。

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新、旧军阀相继夺取了政权，但他们扑灭不了辛亥革命中形成的民主潮流，更阻挡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辛亥革命后，杭州人民在崎岖的道路上继续奋进，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仍取得了一些成就。

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人民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商品输华大为减少，从杭州入口的商品总值，1913年为558060两，1917年下降到136546两^①，不及战前的四分之一，大大减轻了对民族工业的压力。在此期间，杭州近代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有了较快发展。

杭州素有“丝绸之府”之称，丝绸生产源远流长。早在唐朝以前，杭州綾纱已负盛名。从元末至正年间徐一夔的《始丰稿·织工对》看，其时杭州已有十多个工人的丝织手工工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杭州出现了世经、大纶和扬华等新式缫丝、丝织厂，并创办了杭州蚕学馆、浙江省中等工业学堂，造就了一批丝绸技术人才，为杭州丝织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民国初年，杭州丝织业迅速发展，纬成（1912年）、天章（1914年）、虎林（1914年）、云成（1914年）、庆成（1916年）、文记（1917年）、文新恒（1918年）、天丰（1919年）筹较大的丝织厂相继创办。至民国15年（1926），全市已有绸厂近百家，织机上万台，年产各色绸缎达150万匹。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纬成丝织公司首先采用铁机生产，天章绸厂带头使用电力织机织绸，各厂所用原料由单一的蚕丝逐渐掺用人造丝及各种纤维交织，花色品种日益增多，产品内销东北、华北、广东，外销法国巴黎、里昂和南洋各地。民国11年（1922）都锦生创办的织锦厂，另辟蹊径，生产丝织工艺品，产品别具一格，精美绝伦，很快扬名中外。

清朝末年，在杭州已创办了规模较大的通益公纱厂、光华火柴厂以及面粉、肥皂等厂。民国初年，除丝织业外，棉织业、针织业、铁

工业、印刷业等都有些发展。据《民国杭州市新志稿》提供的资料统计，全市工业分 26 类，各类工厂、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共 1231 家。^②其中采用机器生产的不多，大型的近代企业更少，大多是旧式手工作坊，如锡箔业就有 430 家，占全部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毕竟已建立起一批近代工厂，并出现了如武林铁工厂之类的小型机器修造厂。

杭州著名的手工业品“五杭”杭纺、杭线、杭粉、杭烟、杭剪，名闻遐迩，历久不衰。但当时的商业是从属于封建经济的，其发展毕竟有限。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商品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

还在宣统元年（1909），沪杭铁路就全线通车，杭州城站成了客货运的枢纽。在它周围，城站大旅社、清泰旅馆、聚丰园京菜馆、协兴西菜馆、王润兴饭店、吴山第一楼菜馆、活佛照相馆、镜花缘照相馆等相继开设，形成以接待旅客为主的新商业区。

杭州起义摧毁了清朝八旗兵在杭州的驻防营地，打破了西湖湖滨一带的封禁，并把它开辟为新市场。在那里，商业和旅游业互相促进，发展很快。环湖有新新、蝶来、金城、西湖四大饭店，有湖滨、环湖、清泰第二、聚美、新泰、华兴等旅馆，有楼外楼、聚丰园、多益处、知味观、天香楼、西悦来、高长兴等菜馆和功德林、素馨斋等素菜馆，延龄路（今延安路）大街有新新百货店、健华西药房、张小泉剪刀店、陈永泰西木器店等大型商店；迎紫路（今解放街官巷口以西段）有国货陈列馆、圣亚美术馆、陈沅昌文具店、云飞自行车行、华胜镜店等大型商店，它很快成了杭州的闹市区。

围绕湖滨新市场，东有沪杭铁路终点站城站市场，南有位于钱塘江北岸集散木材柴炭的江干市场，北有运河终点以“三行一市”（即米行、纸行、箔庄及鱼市场）闻名的拱墅市场，加上从鼓楼至官巷口的旧市区，形成了一个连接内外的商业网。民国 20 年（1931）调查统计，全市大小商店共有 10363 家。^③

民国初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一些发展。

报刊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它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候。

国人在杭州创办报纸，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拱宸桥日租界发行的《笑林报》。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纷纷创办报刊，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鼓吹维新或革命。但有的很快遭官府查封，有的则易名以趋避，如《危言报》改名为《昌言报》。光复以后党派蜂起他们竞办报纸自我标榜，一时间，《浙江潮》（省议院长王莘创办）、《慧星报》、《寅报》、《之江日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良言报》、《两浙日报》、《新浙江报》、《新民日报》、《浙报》等等相继出现。其中大多数倏起倏落自生自灭有的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激励下，如《之江日报》、《杭州日报》、《新浙江报》等也刊登了一些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和军阀黑暗统治的文章。五四运动前后，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创办的《浙江新潮》、《曲江工潮》等报刊很快成了舆论界的主流。这些报刊触犯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利益，摇撼了军阀专制独裁统治，不久均遭查封。北伐战争伊始，以中共党员宣中华为首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杭州民国日报》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蒋介石叛变革命夺取了浙江政权也接管了《杭州民国日报》。从此，《杭州民国日报》面目全非变成了反革命的舆论工具。

19世纪末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杭州知府林启先后创办了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塾。这是杭州首批出现的新式学堂。20世纪初年在清王朝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杭州又办了一批学堂。加上外人在杭州开办的之江大学（前身为育英书院）蕙兰中学、广济医学校。清朝末年，杭州共有各类大中学堂 41 所。

民国建立后，致力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又公布了全国教育会议决定的学制系统。废除清朝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

旨，确定以培养公民道德为主的教育宗旨；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禁用清朝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规定男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小学实行男女同校 精简课程 缩短学制年限等等。这是一次反对封建教育、推行资产阶级教育的重大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斗争。从反对“丁祭”开始掀起的“一师风潮”就是生动一例。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以下简称一师 的进步学生 逐渐看清了尊孔复古的反动性 反对“丁祭”。具有民主革新思想的一师校长经亨颐 支持学生们的进步主张 他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非孝》一文。于是 守旧分子乘机反扑 诬蔑经亨颐“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主义 于校内发行《浙江新潮》、《校友会十日刊》等报 贻害青年 灭伦伤化”，气势汹汹地要求“严令法办”。^④浙江当局下令免去经亨颐一师校长职务，并宣布改组一师。一师学生奋起抗争，在杭州各校学生的支援下，终于挫败其阴谋。通过这场斗争，广大学生进一步看清了军阀的反动面目，有的进步学生如宣钟华（后改名为宣中华）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迈出了新的步伐。

浙江图书馆的创办，也是杭州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1909）浙江官府将浙江藏书楼 原为文澜阁 改组成浙江图书馆 在孤山文澜阁旁添建馆舍。民国元年（1912）馆舍落成 正式开馆。民国 20 年 又建成大学路新馆舍 作为总馆 孤山改为分馆 以度藏四库全书和善本图书。

民国以来，杭州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风尚。伴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是剪辫。当时人们认为“不剪辫不算革命，也不算时髦”。光复后的第一项措施是剪辫，自动剪，促人剪。杭州光复时同样出现了剪辫的浪潮。清朝统治者强加男子头上的发辫，短时间内在杭州一扫而光，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变化。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主义，为自主婚姻开辟了道路。杭州等城市“民国以来 男女重恋爱自由，已不复如往昔惟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从者矣。大多由双方相恋，取得父母同意而订婚。普通所谓新式婚礼，仅有订婚与结婚两仪

式。始于民初 流行迄今”。^⑤这是又一明显变化。

随着工商业、旅游业的发展，杭州市民的思想观念随之发生变化 奢靡之风愈来愈盛。“绚外而槁中”成了杭州市民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

杭州建市及市政建设

民国 16年(1927) 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 撤销道制 实行省、县两级制，规定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可酌设市。于是，浙江省政府划出杭县城区及西湖全境，即东南沿钱塘江至闸口一带 西至云栖、天竺 北至拱宸桥、笕桥 另设杭州市。这是杭州建市之始。

杭州市区东西相距 26 公里 南北相距 30 公里 东北与西南相距 36 公里 西北与东南相距 23 公里 总面积为 910 平方公里 共有人口 380031 人 划分为 8 个区 城区分成 3 个区、西湖、江干、会堡、皋塘、湖墅等区。建市后 随着工商业、旅游业的发展 人口不断增加。民国 25年(1936) 全市人口增至 530042 人 城区增长尤快，已达 325766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⑥原来的行政区划和设置已不能适应，于是重新划分为 13 个区：城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 6 个区 西湖区改称第七区 江干区改称第八区 会堡区改称第九区 皋塘区分为第十、第十一两个区，湖墅区分为第十二、第十三两个区。

首任杭州市长邵元冲，浙江山阴人。他随北伐军到浙江，任浙江省政府常务委员。邵元冲出任市长后，力图使杭州跻身于特别市行列 按特别市标准组建市政府机构，下设财政、工务、公安、教育、公用、卫生六局，分管各项行政工作；在市府内设总务科，管理文牍、编辑、会计、庶务等事；并呈报中央政府审批。民国 19 年(1930)5 月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市组织法》 规定：“一、首都；

二、人口在百万以上者 三、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形者”^⑦，设市得直隶于行政院”；具有前二、三两款情形之一 而为省政府所在地者 应隶于省政府”^⑧。杭州不具备特别市条件，列为省辖市。于是 市政府机构相应作了调整 裁撤财政、教育、公用、卫生四局 改设财政、教育、工商三科 所有公用、卫生事业 于工务、公安两局内设科办理。

杭州建市，有力地推动了市政建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建市不久 浙江省政府为了“奖励实业 振兴国产”决定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民国 17年(1928)10月 筹备委员会成立 经半年多的筹备，征集展品 147600件 耗资 337517元 于次年6月6日正式开幕 10月20日闭幕 展出 137天。博览会闭幕后 就文澜阁原址，添建房屋数椽，利用剩余的一些展品，建成永久性的博物馆。西湖博览会的举办 不仅促进了工商业、旅游业的发展 也加速了市政建设的进程。

早在民国 10年(1921)，杭州商民已合资创办了永华汽车公司 经营公共汽车 行驶湖滨至灵隐一线 同时兼营出租小客车。举办西湖博览会期间，公共汽车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刺激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会后不久，永华汽车公司出资浇灌了新市场至灵隐的柏油马路 并延长线路 在迎紫路、青年路口添设站亭。

杭州市居民的用水用电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杭州市地处钱塘江下游北岸，由于海水随潮上溯，江水多盐分 严重影响市内水井的水质。民国 17年(1928)4月 浙江省政府决定建造杭州自来水厂，呈报卫生部批准，成立自来水筹备委员会 发行“杭州自来水公债”着手筹办。工程首先要解决水源问题，经反复勘察和水样化验，决定暂用清泰门外贴沙河水，以后改用周家浦的钱塘江北套之水，建自来水总厂于清泰门外，干管分四路接往全市各地。工程完成后，于民国 20年8月15日放水 次日杭州自来水厂正式宣告成立。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人已倡议在杭州建电厂,遭到种种掣肘,未能实现。^⑥光绪三十二年,有人再次发起办电厂,觅定上城区板儿巷口为厂址,经过三年的努力,于宣统二年(1910)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发电厂才建成。共有蒸汽引擎发电机 3 套,锅炉 2 台。总装机容量为 750 千瓦。随着工业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板儿巷电厂受水源的限制,虽两度扩建,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在艮山门外另建分厂。民国 11 年(1922),艮山门电厂开始供电。大有利电灯公司在板儿巷、艮山门两厂共拥有 8 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 7250 千瓦。民国 18 年,浙江省政府将大有利电灯公司收归官办,改名杭州电厂,发行“浙江省建设公债”,以增建闸口发电厂。但遭到商界的抵制,拒购公债,浙江省政府只得将新旧电厂的全部资产、设备及电器事业专营权,又让予由金融界人士李馥荪等组成的“企业银团”。民国 21 年 10 月,闸口电厂建成发电,装有 7500 千瓦的蒸汽涡轮发电机两组,总容量为 15000 千瓦,输电线路电压有 5000 伏和 14000 伏两种,供电能力为当时全省之冠。该厂与南京下关电厂、上海杨树浦电厂,为江南的三大发电厂。

文化娱乐活动也逐渐社会化。

在清代,杭州除灯节、西湖竞渡(某年竞渡溺毙数十人,从此官府下令禁止)迎神赛会外,并无公共娱乐设施。当时的娱乐多局限于家庭范围,官绅富室每逢喜庆,往往邀杭滩、宣卷艺人来家说唱,以娱来宾,俗称“唱堂会”。

民国以来,随着杭州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逐渐出现近代的戏院、电影院。戏院最早出现于拱宸桥。19 世纪末拱宸桥辟为日租界时,有人就在那里创办了荣华戏园,以演京剧为主。民国初年,城站市场、新市场相继形成,影剧院纷起。在城站一带,有凤舞台(不久改称第一舞台)以演京剧为主,后改为杭州电影院,放映电影。在新市场,有大世界、新新娱乐场、西湖共舞台,大小不一,各具特色,其中最丰富多彩的当数大世界。大世界创建于民国 10 年

(1921) 模拟上海的“大世界”规模宏大 演出内容丰富多彩 是杭州市最大的娱乐场所。此后，市区各地先后开设了国货商场、市东剧场、西湖大礼堂、联华影戏院等影剧院。

剧院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杭城戏曲艺术的发展。一种清唱体的曲艺——杭滩 逐渐丰富发展 另一种为佛事‘演说佛书’的念唱曲艺——宣卷 逐渐演化成杭剧 同时还从国外引入话剧。

在此期间，民国 20 年(1931)，在行宫前建造了杭州第一个体育场——浙江省立体育场。

杭州建市后，随着市政建设加紧进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它的前景并不乐观。民国 20 年(1931)发生九一八事变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杭州的丝绸销路大受影响；次年又发生一·二八事变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江浙交通断绝 严重危及杭州工商业，丝绸年产量下降到 49 万匹，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社会经济衰退 省、市财政收入下降 市政建设难以继续 杭州市很快就走下坡路了。

日寇铁蹄下的杭州

中日甲午战争后 根据《马关条约》 杭州被辟为商埠 拱宸桥划为日租界。日本侵略者在拱宸桥设警署 办报馆 开商店 收集各种情报 进行经济、文化侵略 同时在租界区推行‘五馆’政策 鼓励开设戏馆、茶馆、烟馆、菜馆、妓馆 后来又开办赌场 用以吸引和毒害中国人。日本侵略者在拱宸桥的活动，为尔后日军侵占杭州作了准备。

民国 26 年(1937)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件，接着向我国大举武装入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时 11 月 5 日分兵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偷袭我上海守军的后路 并进逼杭州。浙江省主席兼第三战区副司令黄绍竑 令省

市各机关团体向金华方向撤退。12月23日黄绍竑撤离时,下令炸毁闸口电厂和钱江大桥。24日上午10时许,日军从武林门侵入市区,并向南星桥进发。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到了江干,更大肆纵火焚烧,从南星桥至闸口一带尽成焦土。日军侵占杭州时,居民除被杀害者外,纷纷逃亡,全市剩下不过30余万人。

日本侵略者派“枪部队”驻守杭州,设司令部于大学路浙江大学、省图书馆等处,相继成立宪兵队和“梅机关”等公开或秘密的情报特务机构,捕杀抗日志士,残害中国人民,并收罗汉奸、地痞,组织伪政权,以推行“以华治华”的侵略政策。

在省、市政府撤离杭州之前,杭州市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已在酝酿组织维持会,邀帮会分子、市救火联合会总干事王五权任其事。当日军进入市区时,杭州市商会会长谢虎丞偕王五权等前往武林门迎接。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他们先后组建“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杭州市自治委员会”为日军征集粮食物资,巡逻治安,劝说逃避到郊区的市民返回市内,并乘机敲诈勒索,掠夺财物,大发国难财。

民国27年(1938)3月,南京汉奸组织的“维新政府”成立。6月,派汪瑞闾、何瓚充当伪浙江省长和杭州市长。何瓚到任不及一年,即为抗日志士所刺杀。何瓚死后,其职由伪市府秘书长谢恪暂代。次年6月,“维新政府”继派吴念中为伪杭州市长。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于民国29年(1940)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先后派傅胜兰、汤应煌、谭书奎为伪杭州市长。谭书奎被抗日志士刺杀后,先后由陈次溥、杨寿章、孙祖基、叶震东任市长,最后由吴念中复任伪杭州市长,直至日本侵略者投降。在此期间,伪浙江省政府组织“和平军”和警察大队,建立“清乡委员会”,汪伪政府在杭州民生路四十六号还设立特务机关,简称“四十六号”,配合日军清乡扫荡,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

在日伪的统治下,杭州市遭到空前的浩劫。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先以日机对杭州狂轰滥炸，继则日军占领杭州，大肆烧杀掳掠，不择手段地劫夺和破坏杭州工厂企业。如日军强占民生药厂在武林门外的玻璃厂，在拱宸桥开设大东药房的日本特务西川，也乘机占夺该厂在官巷口的同春药房总店。又如日本侵略者鉴于日本丝织品在国际上难以与杭州都锦生织锦厂的产品竞争，竟丧心病狂地放火把该厂在艮山门外的厂房和新式机器全部焚毁。杭州工商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接着，日本侵略者在杭州开设正金银行、阿部市洋行、白木公司、棉织厂等金融和工商机构，操纵杭州市场，垄断社会经济。尔后汪伪政权建立所谓中国储备银行在杭州设分行发行储备券，强令市民以我国法币两抵一调换储备券，疯狂地掠夺广大人民手中的财富。

民国 30 年(1941)，日本侵略者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急需大量物资补充，于是加紧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汪伪政府秉承主子的旨意，于民国 32 年上半年建立了一个旨在掠夺物资的机构——“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把米粮、油脂、纱布、五金、日用品统统列为统制物资，一面加紧对沦陷区人民搜刮，以供日军的急需；一面打着“日华经济合作”的旗号，指使一些汉奸、特务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强令工厂开工生产。以丝织业为例，日本侵略者成立“华中蚕丝公司”，垄断江浙皖的蚕丝，以原料厂丝、人丝、绢丝易货，要各丝织厂加工定织绸缎。这些丝织厂完全成了日本经济侵略的附庸。

当日军逼近杭州时，杭州的大中学校多迁避他乡。日军占领杭州后，对杭州的文化教育设施和名胜古迹大肆破坏。省立医专、清波中学、盐务中学等校的校舍被夷为平地，数百年古建筑旧藩署，尽行拆毁。

日本侵略者为实施奴化教育，在杭州先后开办了省立中学、市立中学、模范中学、希甫中学、女子中学等学校，还开设了日语专门

学校、东亚日语学校、日语学校。不论日语学校或普通中学 都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在这些学校中 通过各种形式 大力灌输“大东亚新秩序”、“日支同文同种”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以毒害中国青少年。

在日伪统治期间 日军、伪军、汉奸、特务、密探以及地痞流氓充斥全市 他们为非作歹 戕害人民。日本侵略者在杭州设立“浙江省戒烟局”、“杭州市戒烟局”名为“戒烟”实则垄断毒物 以牟取暴利。在“戒烟局”的名目下 全城开设的烟馆有百十余处 真是“烟馆林立 烟灯满城”。日本侵略者为了供日军泄欲 从本国运来“日本下女”建立“慰安所”。一些汉奸、特务投其主子所好 拐骗了中国的一些良家妇女 也开设“六三亭俱乐部”等妓院 又搞了大量变相的妓院——“向导社”他们还在杭州各地遍设赌场 公开聚赌，以诈骗钱财，杭州城被搞得一片乌烟瘴气。

八年沦陷期间，杭州市民大批惨遭杀害，受尽种种污辱和磨难 加上物价腾贵 柴米更难买到 时刻处于惊恐和饥饿之中。

浙江省政府撤到金华、永康之后，为图在沦陷区恢复地方建置。杭州沦陷后，杭州市长周象贤已辗转逃往重庆。民国 31 年（1942），浙江省政府命杭县县长陈纯白兼杭州市长，不另设机构，市府人员由杭县原班人马兼任。陈纯白将杭县自卫大队扩编为总队 番号改为杭州市自卫总队 活动于市郊三墩、勾庄、康桥、瓶窑、塘栖等地，并派遣人员进入市区，收集日伪军政情报。

杭州人民反对内战，迎接解放

民国 34 年（1945）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

国民党省、市政府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赶忙返回杭州接收，彼此间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活动于市郊的杭县县长兼杭州市长陈纯白，率先带领市府人员入城，接收了设在三元坊兴业

银行内的伪杭州市政府。不久，弃职逃往重庆的原杭州市长周象贤奉总统府之命也匆匆赶回杭州复任。由于周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宋美龄的留美同学，靠山硬，陈纯白不得不交出市长大印。在周象贤的主持下，恢复了杭州市的建制，把全市重新划分为 8 个区：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江干区、艮山区、笕桥区、拱墅区，并通过市参议会向中央政府再次建议晋升杭州为特别市，但仍未获准。

抗战胜利后，迁避外地的杭州市民陆续返回故里。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筹集资金，修缮房屋，添置机器设备，重整旧业，一时间商店纷纷开门营业，工厂纷纷开工生产。据抗战胜利后不久的调查统计，全市工商业分 26 类，113 个行业，大小商店、工厂、企业有一万多家。^⑧可是，它们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困难，很快又陷入困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力谋恢复其对全国的独裁统治。一方面，他们肆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劫收日伪资产以饱私囊，官僚资本迅速扩展，他们为了换取美国的剩余物资和贷款，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一连串协定，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掠夺中国的财富。始初，美国以“剩余物资”“救济物资”为名，在中国倾销美货。如大量美国奶粉运销杭州，使杭州的牛乳业难以维持，纷纷倒闭，不得不把奶牛杀掉或改作耕牛。又如大量美国香烟在杭州抛售，竟占全市香烟销售量的 80% 以上，杭州卷烟厂生产的香烟销量大幅度下降，由减产而倒闭。接着，在美国的支持下，官僚资产阶级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垄断机构，更严重地威胁着民族企业的生存。以在杭州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丝织业为例，抗战胜利之初，杭州有丝织厂 120 多家，由于官僚资本所设的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垄断进出口贸易，控制美棉和人造丝，使这些工厂产销两难，陷入窘境，加上物价飞涨，更难支持，纷纷倒闭，到解放前夕仅存 50 多家。^⑨另一方面，他们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发动内战，企图凭借其优势的武器装备，消

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再次把中国人民抛入战争的火海。随着内战的扩大，加上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疯狂掠夺，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崩溃，通货膨胀恶性发展，把社会各阶层人民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迫使广大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起斗争。

在杭州，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卖国家主权和美军的暴行开始的。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民国 35 年(1946)6 月 5 日 南京国民政府急不可待地通过“暂时开放内河航行”的决定，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内河航行权。杭州学生得到这一消息，同月 11 日在浙江大学集会 成立“杭州市大中专学生联合会”并于 13 日上午 浙大等 20 余所大中专学校学生 5000 余人 冲破反动当局的阻挠 举行游行示威，并前往梅花碑向省政府请愿，提出了反对内战、组织联合政府、反对出卖内河航行权、反对外国军队驻留中国等革命要求。

同年 12 月 24 日 在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抗议美军的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地展开。浙大学生成立抗暴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杭州各校学生纷纷行动起来，集会声讨美军的暴行。次年 1 月 8 日 杭州 8 所大中专学校学生 3000 余人 上街游行示威 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回去！”并散发《告同胞书》。接着 金华、温州、宁波等地纷起响应 在全省掀起了反美抗暴的爱国浪潮。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人民的统治和搜刮。在城市，其矛头主要指向工人阶级。抗战胜利后 反动当局就不断派遣‘特派员’去操纵工人组织 仅民国 35 年一年，杭州市被改组或新组的工会就有 99 个之多 企图借此控制工人的活动。民国 36 年(1947)2 月 又颁布了“经济紧急措置办法”将工人的工资冻结在民国 35 年 12 月的水平上。然而物价

却迅猛飞涨 以米价为例 该年 1 月 1 日杭州市每担售价为 5600 元 到 5 月 10 日竟达 345000 元。^①短短 5 个月时间里 上涨 61.6 倍。杭州工人针锋相对展开了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早在民国 35 年 9 月间 天章、纬成、庆成、新华、振丰等丝织厂工人 已相继向市政府请愿，提出了保障工人的工作和人身自由、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次年，杭州工人的斗争进入高潮。3 月 人力车夫万余人 因加租等不合理规定，全体罢工；4 月 电机、丝织工人千余人集会 要求增加工资；5 月 丝织、棉织、营造、电话电报等工人联合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同月 铁业、造纸厂、纱厂等工人联合罢工 并举行游行示威 反对内战 要求增加工资；10 月 杭州第一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爆发了千余人的罢工……

米价飞涨，严重威胁着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浙江粮食公司、民食调节委员会不仅不设法调剂，反而伙同投机奸商，囤积居奇 抬高米价 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愤慨 于是 掀起了群众性的打米店风潮。民国 35 年 2 月 杭州已爆发了一次打米店斗争。次年 5 月 2 日 再次爆发规模更大的打米店斗争。这次斗争从东街路开始，各阶层群众踊跃参加，迅速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分路前往捣毁各处米店。这场斗争持续了一天一夜，捣毁米店 300 多家，还冲击了警察二分局。这是杭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打米店斗争 影响很大。上海、南京及省内的嘉兴、瑞安、绍兴、吴兴、富阳、永康等地接踵而起，形成了地域相当广阔的米风潮。

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推动下，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猛烈展开。为了抗议反动当局制造五二〇南京血案 血腥镇压学生运动 民国 36 年 5 月 24 日 浙大等校学生三千多人 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6 月 2 日 浙大学生举行‘全国内战死难同胞追悼会’；7 日 浙大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浙江反动当局惊慌失措，为了破坏杭州学生运动，图谋加害其组织者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10 月下旬，中统浙江室特务秘密逮捕并杀害

于子三。浙大学生获悉这一消息，同月 30 日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愤怒谴责当局的法西斯暴行。11 月 4 日 浙大校长竺可桢去南京，向教育部申诉，对记者发表谈话，揭露事件的真相。10 日 浙大学生发表《为反对非常逮捕、反对残杀学生、反对特务暴行、继续罢课再告全国同胞书》 派遣人员分赴学校、工厂和街头进行宣传。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广大学生纷起响应 围绕于子三事件 猛烈抨击反动当局的暴行 形成了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求生存’的革命巨浪。

面对滚滚而来的群众运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改组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以缓和矛盾 并加强其统治。民国 37 年(1948) 7 月，派军人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以其亲信任显群接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陈、任目睹革命运动蓬勃高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和帮助下，决心弃暗投明，并函嘱其旧部汤恩伯举义，不料为汤所出卖。次年 2 月 蒋介石派周 岳带兵入浙任浙江省主席，调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为杭州市长。陈仪被逮捕，后押往台湾被杀害；任显群得悉陈仪被撤职逮捕后出逃。

民国 37 年(1948)底 38 年(1949)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下游的江北广大地区，迫近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民国 38 年 3 月 中共上海局决定统一杭州的党组织，将直属上海局的两个工委合并为中共杭州市委，林枫任书记。中共杭州市委建立后 立即发出“反破坏、反迁移 保卫城市建设 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 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城市政策教育和会师教育。在中共杭州市委的领导下，市里的电台、报社以及比较重要的学校、工厂都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纠察队和护厂队 广泛发动和团结群众 开展护厂、护所、护校和保卫国家资财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

团向杭州方向进发。5月3日下午三野第二十一军首先进入杭州城，当晚第二十三军也到达杭州市区。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谭震林任主任，谭启龙、汪道涵任副主任。11日中共杭州新市委成立，谭震林兼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杭州市人民昂首阔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作者 徐和雍）

注：

- ①《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十四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
该资料来源不详，文内提及民国20、21、22年不一，至迟为民国22年的调查统计资料。
干人俊：《民国杭州市新志稿》见《杭州地方志资料》第一、二辑第153页。
- ④《浙江省议员黄尚傅等致大总统等电》，《五四期间的社团》（三）第143页。
- ⑤《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十七册“民族”第5页。
- ⑥参阅：《杭州地方志资料》第一、二辑第15、3—4页。
- ⑦见傅荣恩：《江浙市政考察记》“附录一”第139页。
- ⑧参阅徐名奎：《重新考证杭州电力工业的起源》，《杭州市志通讯》1988年第3期。
- ⑨杭州市政协文史编辑室：《解放前的杭州工商业》，《杭州工商业史料选》第10页。
- ⑩《杭州工商业史料选》第21页。
- ⑪《东南日报》民国36年1月1日、5月30日。